

北京文物与考古系列丛书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軍都山墓地

玉皇庙(一)



文物出版社

平都山志



北京文物与考古系列丛书

军都山墓地

——玉皇庙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编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7

封面题签 宿 白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编辑 于炳文
王 铮
责任印制 张道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都山墓地: 玉皇庙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5010-2126-0

I. 军… II. 北… III. 墓葬 (考古) — 发掘报告 —
延庆县 — 东周时代 IV. K878. 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2397 号

军 都 山 墓 地

——玉皇庙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编著

*

文物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9×1194 1/16 印张: 143.75 插页: 4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126-0 (全四册) 定价: 1200.00 元

本课题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文物局重点文物保护
专项资金及北京市文物局出版基金支持

内 容 简 介

1985 ~ 1991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考古队以冀北山地东周时期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主要内涵特征之一的文化遗存为专题，在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进行了考古调查，并选定了玉皇庙、葫芦沟、西梁垆三处墓地作了科学发掘，共发掘东周时期墓葬 594 座，出土各类富有特点的大小文物 6 万余件。其中以玉皇庙墓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为丰富，所获资料系统而完整，是迄今冀北山地一带所发现的此类文化遗存中最具代表性和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一批资料，其文化面貌既不同于燕和中原文化，也不同于同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特命名为玉皇庙文化。发掘者从地望、时代、文化内涵与埋葬制度特征，以及经济形态特点，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考证，“玉皇庙文化”的主人应与中国先秦历史上以畜牧和游牧为生的山戎部族有关，军都山墓地应是东周时期聚居在这一带地域的山戎部落墓地。

这三处墓地的考古学资料，对探索冀北山地此类文化遗存的源流与发展具有突破性意义，对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科技史与艺术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介绍的为玉皇庙墓地的资料，葫芦沟、西梁垆两处墓地的考古发掘报告也将近期出版。

苏秉琦先生关于开展军都山考古调查和 视察葫芦沟、玉皇庙墓地的三次谈话

（一）苏秉琦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谈话 （1985年7月12日上午）

苏先生：听说你（指靳枫毅）离开了琉璃河，去了北京？

靳枫毅：是，刚过去一个月。

苏先生：现在做什么？

靳枫毅：正想去北郊军都山调查那一带出的直刃短剑遗存问题。

苏先生：怎么想的？

靳枫毅：我看过河北滦平、宣化等地的一些材料，最近又看到延庆县农民交来的一些短剑，都是直刃短剑，跟辽西地区曲刃短剑的形制、风格完全不同，我想会不会是两种文化的东西？所以想搞一个专题调查。

苏先生：这个想法好，你对辽西曲刃短剑已经比较熟悉，夏家店上层文化了解较多，又了解了琉璃河西周的燕文化，现在想搞这项调查，有基础。长城地带，燕山南北，两种短剑，两种文化，该弄明白。你要多跑些地方，不要局限延庆，要放眼滦河、桑干河，要把冀北、京、津、唐地区，承德、张家口地区，全面考察一遍。然后再看辽西夏家店上层文化，再看琉璃河和易县燕下都差别在哪里？夏家店上层文化南边到哪里？还不清楚，这需要拿材料讲话。希望你能拿出材料来，最终拿出发掘材料来。记住，考古学研究，

最终是要用发掘材料说话的！

靳枫毅：我试着做做看，等有了发掘材料，我一定第一个请您看。

苏先生：好，那咱们一言为定！

（二）苏秉琦先生在葫芦沟墓地的谈话

（1985年11月14日）

葫芦沟这个墓地和遗址出土的东西，从总的来看，是北京军都山一线一种独特的地方性的少数民族文化，它与燕国文化和中原同时期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它不仅是北京地区青铜文化，而且也是整个北方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一颗火花。这颗火花就在军都山、桑干河到潮白河流域闪光。过去我们北京地区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几乎是空白。这个墓地出土的这一批材料非常宝贵。从陶器看，南北两区在形制、器类和组合关系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在看了几个短颈罐、中长颈和比较长的颈罐后说）陶器看来可以排出序列。（以后又看了南区与夹砂红陶共存的泥质灰陶后说）折肩罐形式也不完全一致，也有一定的变化，看来也要仔细琢磨，看看能否排出序列来。（看了泥质灰陶豆后说）你们这一批陶器，从整个器物群特征看，不仅与中原同期文化的陶器群特征不同，而且与北京地区燕国的陶器特征也完全不同，这个墓地的陶器是自成体系、自有特点的一群。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拿这个墓地的陶器去比中原、去比燕国的陶器。（看见44号墓泥质灰陶罐，苏先生端详良久说）你们看，这个墓已经出尖首刀币了，但是陶器还是手制的，尽管是泥质灰陶。你们看这个陶罐是分三道工序做成的。首先是做了个口沿，像个面包圈，然后又做了器底，像个烧饼，再做出器物腹部，然后把口沿、腹部、器底三个零件再捏到一块。看器底和腹部衔接的样子，像是先把口沿和腹部粘上，扣到地上，然后再把器底从上面扣到腹部，将腹部和器底捏到一块做成的。（看了带指甲纹的三足罐后说）好极了，这就是他们的东西。夹砂的，火候很低。今天时间短了，来不及仔细观察。回到北京后我们一起把三足跟腹底衔接的情况要仔细研究一下，弄清楚是怎么做出来的。（苏先生仔细看了三足罐腹壁上的纹饰，说）看来是指甲纹。

苏先生看了各式青铜短剑后说，各墓出的短剑，型式都有差别，没有重复的样式，工艺水平很高。（看了52号墓出土的剑以后说）这么锋利，像是白铜。（他问靳枫毅）有没有型式相近似的两把剑？（靳答：M39和M10出的剑还比较接近些）苏先生看了后说，是比较接近些，但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短剑出现的这些型式上的差别，对我们考察这个文化青铜兵器的制作很有价值，提供了可供研究的丰富的资料。但同时，也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这些剑当中，到底哪一种型式是比较早的，哪一种是比较晚的？

要回答这一问题，光从剑的型式上分析，恐怕不行。我看一定要参考出土青铜短剑墓葬的陶器的特征，从陶器型式的变化来揭示每一种剑的早晚。这样比较可靠。为什么这样说呢？青铜兵器可以传代，可以沿用。陶器则不同，它坏了就扔了，再重新捏一个。这个墓地的陶器都是实用的。陶器型式的变化相对来讲要快一些。所以把握陶器型式的变化来判断墓葬时代的早晚是比较可靠的。

苏先生看完了铜刀后说，出铜刀子的墓大都有陶器共存，有的还有青铜短剑共存。材料十分可贵。从铜刀的型式看，早晚有明显变化，有的铜刀子已经变得形体很小，而且很薄，在刀柄上已经出现了两道线纹。（靳给他看了一把铜刀，并说，我们这里有向刀币过渡的那种型式的铜刀）苏先生看后说，像这样的刀子，体形变得这样小，又很轻，刀片又变得这样薄，而且刀柄上出现了两道线纹，能削什么呢？确实有点像刀币了。我赞同你们的意见。（然后又看了 M44 之尖首刀币）苏先生说，这个尖首刀币有没有陶器与之共存？（靳拿出泥质灰陶罐）苏先生一见陶罐，拍手叫好，说快拿给我看看！看后问，尖首刀币就这一个例子吗？（靳答现有五个例子）苏先生说，很好哇。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发现中还很少啊。它不仅对铜刀子型式的演变研究有意义，而且对尖首刀币出现的时代提供了比较可信的依据。苏先生问：这五个例子出现在哪一部分？（靳答：出现在南区）这个情况值得重视。你们这里出了这么多铜刀子又出了这么多尖首刀币的例子。难道尖首刀币是出现在咱们北京地区吗？我说一个意见供你参考。在整理这批材料的时候，特别是在研究墓地的分期问题的时候，除了我刚才说的要重视陶器的形式的变化这一条件外，认真仔细地琢磨铜刀子的形式的变化，把有铜刀子和陶器共存的墓中刀子的形式要加以比较，这样区分出早晚，然后以刀子的形式的早晚再来区分没有铜刀子的墓葬的陶器的变化。并用铜刀子的变化来区分青铜短剑形式的早晚。你们这个墓地的铜刀子能排出一个发展序列，看来没有问题。

苏先生看了几个铜带钩以后说，你们这个墓地的铜带钩形式很新鲜，我过去很少见到这样的，有特色。看了 M23 带钩后说，这像个鸟，两个翅膀都张开了，是写实的。看了 M79 带钩后说，这也是鸟，要立起来看。

说到在墓地南区发现一处用大的河卵石围成的祭祀遗迹时，苏先生问是什么样的形式？（靳回答：共有十五块石头，围成一个椭圆形，中间一块石头较大）苏先生问：是自然石块还是经过人工加工的？（靳答：是自然石块，都是尖朝上，站立着的）苏先生问：祭石周围有什么发现？（靳答：祭石北、东、南和西南侧都发现有墓葬。只有西北侧没有发现墓葬。这些墓口都开在夹砂褐土层中。我们画了地层图。到目前为止发现祭石东侧 104 号墓压在祭石之下）苏先生说，回头咱们去看看。看过祭石后，苏先生说，新石器时代有东山咀遗址，但是北方地区青铜器时代的祭石遗迹还没发现。祭石的意义与宗教意识有关这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祭山，或者是祭祖，或者还有多方面的含义。你们要把

祭石遗迹周围和下面的情况仔细地搞清楚。这些祭石是这个墓地的祭祀遗迹呢，还是这一群人平时祭祀活动的遗迹呢？这个还得琢磨琢磨。

苏先生在工地时说，墓口要平整，这样照片出来好看。拍照时要尽量垂直拍墓坑，这两点要注意。他看了 M57 的夹砂环耳器后说，这是杯。

苏先生说，看了你们的東西，我很高兴，但是最高兴的还是你们。你们比我高兴。你们付出了很多艰苦的劳动，搞出这么多的墓葬，出土这么多的东西，怎么能不高兴呢？咱们搞事业的人，搞专业的人不容易啊，有时候还要担一些风险哩。你们这些东西很多，很好，但都打地摊，东一堆，西一堆，也没摆到架子上去。别人参观看了也分不清是哪个单位的。没有架子不行，这是工作的基本条件。文物不按单位排在架子上不行，既不便整理，也不便参观。过去我对北京地区文物工作了解得很少，摸不清他们的工作项目和内容。看来今后北京地区的文物工作很有希望，而且很有潜力。我希望你们在研究这批材料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满天飞。我这里说满天飞的意思，是希望你们不要与中原的、燕国的、还有东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去比较。就像泥质灰陶长柄豆，即使从外貌上看可能与中原的同时代的同类器形相近似，那也没有必要和他们比。这批材料，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两码事，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所以也没有必要与它比。因为你们这批材料、这群器物是完整的一体。它有自己的特点，有自身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有自己的发展序列。只要我们认真仔细地继续钻研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文化的发展序列是能够建立起来的。我希望你们能像锥子一样往下钻，钻到底。我国著名的大学者、地质学家翁文浩说，我是属锥子的。他是搞地质的，研究地球的。他主张在一个点上要打透，彻底搞清一个点的问题。你们这个墓地，这批材料，我说得直白点，就是要完全、干净、彻底地挖完，从而获得一批比较完整的研究资料。在这个基础上，把同类的文化遗存，包括遗址和墓葬，作为一批材料，作为一个课题，要花工夫，花时间搞完。到那时，我们来讨论这个文化就有更多的发言权了。

（三）苏秉琦先生在玉皇庙墓地的谈话

（1986 年 5 月 22 日）

这个工地才开工 20 多天，发掘面积已达 5000 多平方米，发现墓葬百余座，清理了近 50 座，已清理完 30 多座，这样的效率不容易。

去年，我看了你发掘的葫芦沟墓地，是一次突破；今年，又在玉皇庙发掘，是扩大了战果。这样做工作很好。

军都山京张公路沿线，是属于夹缝地带，这一带地区分布着这种不同于琉璃河和易

县燕下都的燕文化遗存，是合理的，是可以理解的。看来，沿京张公路，到桑干河流域，这种文化遗存，还会有发现，今后要多做些工作。

葫芦沟的工作打开了局面，又有玉皇庙，还有张家口白庙，这使我们可以联系起来考虑问题。没有完全相同的结果，各个地点的发掘成果，都必然有差别。葫芦沟、玉皇庙就有差别。总的看来，葫芦沟墓地在年代上晚于玉皇庙墓地。在年代序列上，由于玉皇庙的发掘，使这个文化又在葫芦沟墓地的基础上，向前提早了一段。从规模上看，玉皇庙墓地的面积比葫芦沟的大，墓葬数量也比葫芦沟的多，墓里出土的东西，也比葫芦沟的好，比那里的精彩，比那里的丰富，而且玉皇庙这里有级别高的大墓。这个墓地不知往东还有没有墓了？（靳答：往东、往南还有墓，而且比较密集）。苏先生问：现在已发掘的面积，估计占整个墓地的面积多少？（靳答：大概仅占一少半）苏先生说：那就是说，还有一半，甚至一多半未发掘。我估计也还会有，不知能延伸多远？（靳答：估计有可能延伸到东坡那里）。苏先生说：这么大的面积和数量，你要沉住气，别太着急。经费不够，要想办法宣传鼓动，让领导一步一步地解决。只要我们做工作，有积极性，有热情，把工作干好，成绩摆在那里，这个问题我看不难解决。国家文物局也看地方主管部门对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有没有积极性，肯不肯出血，如果地方自己肯出血、有热情、大力支持，国家文物局自然也会有积极性、大力支持。地方主管部门的领导、国家文物局的领导，这两方面的宣传工作，你都要去做，这样才能把事业干好干成。

葫芦沟、玉皇庙、白庙，可以互相补充。葫芦沟的短剑，排序列有困难，但有了玉皇庙这批材料，短剑发展序列问题，有可能解决。因为玉皇庙的器物组合比较全，可以作全面比较。

玉皇庙 M32 出土的铜戈，年代偏早，可能是这个墓地现已清理出来的墓葬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墓。

去年看了葫芦沟的材料，很高兴，今天又看了玉皇庙发掘，更高兴。希望你沉住气，全部、干净、彻底地挖完，拿到一份完整、系统的考古资料，这个课题有希望获得突破。该测定的项目，现在就要做，能与发掘同步进行的，尽量同步进行，不要坐失良机。技术性的问题，自己处理不了的，要赶紧找考古所技术室王振江他们帮忙。另外，你一定要设法照好这个基地的全景相，花点钱是值得的。有很多大工地，最后出报告时，连张像样的全景相都找不出来，可惜啊！你要吸取别人的教训，总结别人的经验，为我所用，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序

靳枫毅同志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 1978 年至 1981 年期间，培养过的中国北方民族学与考古学的研究生。毕业后他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学习勤奋，肯下苦功夫，因此早已取得很高的成就。

1985 年至 1991 年，由他任领队主持调查和发掘的军都山玉皇庙等三处山戎文化墓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考古实践中，他勤于思索，刻苦钻研，就山戎文化墓地的发掘提出了不少重要学术课题，并作了深入探讨，先后发表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的特征及其族属问题》、《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等多篇学术论文，提出了很多颇有建树的观点，受到考古界和史学界的关注与好评，有的成果还被全文译成日文介绍到国外。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靳枫毅又倾数年心血，和他的同事一起，共同编著了《军都山墓地》这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其资料之翔实，描述与分析之细致，观察与研究之深入，自不待言，这也是他对这门学术的建树与贡献。

1986 年 6 月，我曾去过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发掘现场，看到已经发掘出来的许多东向的墓葬，出土有大量的殉牲、陶器、直刃短剑、削刀、动物形牌饰和带钩等，草原文化气息浓厚，特点清楚，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在北京地区找到这类文化遗存，实属不易。

1990 年 8 月我应邀出席过在延庆县召开的《北京东周时期山戎文化考古成果研讨会》，曾讲了 6 个问题，现略加整理，权作此书之序。

一 调查、发掘军都山墓地的缘由

大家知道，青铜短剑问题，是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国

际性的一个课题。关于曲刃青铜短剑问题，是靳枫毅的第一个考古学研究课题，他曾作过系统认真的研究。他发现朝鲜半岛的曲刃青铜短剑（即细型铜剑），剑脊和叶刃部分有节带特征，状如竹节，而辽西地区和东北其他地区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没有节带，同时还对与曲刃青铜短剑共存的器物群作了综合考察与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推断曲刃青铜短剑源于辽西地区，可能为东胡民族所首创，而后又影响及邻近地区的其他文化，他不同意属于古朝鲜。他的意见受到了国外重视，日本学者曾将他的论文全文翻译发表在日本考古学杂志《古文化谈丛》上。他在研究含曲刃青铜短剑文化遗存时发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南山根类型中，有曲刃青铜短剑与直刃短剑共存的现象，另一种情况是在冀北山地一带，则有一些单纯直刃短剑的遗存。那么直刃短剑和曲刃短剑这两种文化遗存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就引起了他的思索。后来，他到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便开始搞他的第二个课题，即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问题。当他发现延庆这里的线索后，便及时开展了调查与发掘工作。

二 关于玉皇庙墓葬的特征

1 陶器，玉皇庙的陶器是红色夹砂陶为主，早期多为扁圆腹罐，这是最主要的；晚期出现泥质灰陶器，器型有两种，一是折肩罐，二是高柄豆。类型很简单，器形也很简单。

2 墓葬，主要是长方形的，中小型墓葬多，大型墓葬有一种“凸”字形的，还有一种是抹角梯形的，但最多的还是长方形，所以这里的墓葬是以长方形为代表的一群，无腰坑，无壁龛，无墓道，有二层台。

3 祭牲，大中型墓主要殉马、牛、羊、狗，一般小型墓主要是羊和狗。YYM18、YYM250的死者是两个相当有身份的人，一墓殉杀的马、牛、羊、狗竟多达二三十只。

4 覆面习俗，用麻布做的用于蒙脸、带铜扣的覆面巾，在死者的头骨眼窝、鼻端部位往往遗有铜扣，有的铜扣的穿鼻里还遗有麻线痕迹，覆面习俗是这里的一个突出特点。

5 短剑，这里的青铜短剑都是直刃的，剑身与剑柄是连铸的。剑首上花纹最多的是盘羊角纹，尤其早期的盘羊角纹较突出，晚期是蛇形双环孔式柄首为主，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柄部镶嵌绿松石，如YYM156就是其中一例。

6 牌饰，这里的牌饰都属于单体写实动物形半浮雕，马、虎、鹿都是单个成形，没有双马、双虎、双鹿组成一件牌饰的。动物形牌饰中以马形为最多，这里的牌饰多带有嵌窝，原来应是镶嵌绿松石的。

7 带钩，这里带钩的形式和中原的长带钩不一样，造型有马、瑞兽、蛇、蛙、刺猬和鸟等，带钩上也同样嵌有绿松石。镶嵌绿松石工艺，见之于青铜短剑、牌饰和带钩，是玉皇庙文化器物特点之一。

8 青铜礼器，这里发现有中原或燕的铜礼器，如铜鼎、敦、鬯、盘、匜、铉等，花纹有兽面、鳞纹、勾连云纹等，这反映出青铜器成分中有文化交流的现象。回溯 2000 多年前，站在八达岭上向南望是燕人之野，朝北望就是放牧的山戎。

9 尖首刀，这里有数例尖首刀出土，它们与青铜削刀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

10 关于炭化谷物，在玉皇庙墓地 YYM2 和 YYM18 的铜罍里，遗留有炭化谷物，看似粟粒，但到底是不是粟，还有待专家鉴定。这说明这里多少有一点农作物痕迹。

以上十点，反映了玉皇庙遗存的个性与特征，决定了它是一个单独的文化。

三 玉皇庙遗存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区别

从墓葬形制上看，夏家店上层文化多为石棺，玉皇庙墓地均属土坑墓。从陶器上看，颜色大体一致，夏家店上层有红陶、红褐陶，这里也有红陶、褐陶，也是夹砂的。但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有鬲，这里主要是罐，不见鬲。鬲在红山以后还是北方的东西。夏家店上层的鬲与这里的罐是有区别的。第三点区别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有石斧、有孔锤斧和石刀。玉皇庙这里没有这类石器，而只有砺石，鄂尔多斯也没有这类石器。所以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器是很有标识意义的。第四点是青铜短剑，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短剑是曲刃、分铸的，剑柄端加有枕石；玉皇庙的短剑是直刃、连铸的，剑柄端不带枕石，二者区别甚为明显。

四 玉皇庙遗存与鄂尔多斯遗存的差别

在鄂尔多斯遗存的陶器中，毛庆沟那里虽然也有红陶，但更多的是泥质灰陶，灰陶是轮制、带细绳纹的；玉皇庙主要是夹砂红褐陶罐，即使晚期有泥质灰陶罐，但也很少有带细绳纹的。桃红巴拉的陶器是夹砂手制的，有带把的罐，玉皇庙的陶罐没有带把的，这看出二者在陶器上是有区别的。从青铜短剑上看，从大系统上讲都属于直刃剑，但二者之间仍有一些差别，如柄首，鄂尔多斯有鱼形柄首，还有触角和变形触角式的，与玉皇庙这里盘羊角式和蛇形双环孔式柄首是不同的。还有玉皇庙早期阶段短剑剑柄上往往带有穿鼻，而鄂尔多斯则不见。从牌饰上看，鄂尔多斯都是双牛、双马、双蛇、双鹿、双羊、双兽纹、双鸟纹，都是一个牌饰上两个动物，而玉皇庙这里都是单体动物。另外，鄂尔多斯牌饰上有虎咬猪、虎咬马、虎咬羊，这种咬斗纹的牌子，玉皇庙这里没有。还有，鄂尔多斯有青铜鹤嘴斧等工具，而玉皇庙这里不见。以上这四点它们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因此，玉皇庙既不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也不是鄂尔多斯文化，玉皇庙应是一个单独的文化。

五 关于族属问题

山戎，历史文献上有记载，也称北戎。山戎没有专记，只散见于《管子》、《春秋》

等文献中。《东洋历史大辞典》第三卷三九二页山戎条：春秋时代蟠居在北方的蕃族，也称北戎。《礼记》王制篇，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山戎依《史记》集解，是鲜卑的一种，亦即北方蒙古族系通古斯族的一种。

北戎，《史记·齐太公世家》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又同书《秦本纪》成公元年，“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穀梁传·庄公二十九年》，又《左传·庄公三十年》，以及《管子》大匡篇、小匡篇，对于占据齐之北边，燕之近边的山戎，亦有多处记载，大略相当河北省北方山谷之间，其中心应在迁安县。春秋时代，山戎常入寇燕、齐，为燕齐边患。齐桓公与鲁国联合北伐之，收得大功。见《左传》、《穀梁传》、《公羊传》各庄公条、《史记》齐世家、燕世家、秦本纪、《管子》等，考定较翔实。

齐桓公北伐山戎，得到了山戎的冬葱和戎菽。菽是一种豆类，齐桓公带回了齐国。这条材料告诉我们，山戎是有点农业的，从文献上透出一点信息；从出土遗物看，还有点谷物种植的痕迹，这两点是一致的。游牧民族种地，有点农业这并不奇怪，也不只是这个地方有。像东胡人，也种点东西，也搞点农业。中国的历史是复杂的，不能从概念出发来看问题。周灵王三年（公元前569年）山戎与晋和好，常拿虎皮、豹皮去做买卖，做交易，这是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就打。公元前541年，无终群狄与晋战，山戎和北方的狄人一起到了太原，大闹太原。山戎和齐发生过关系，西边与晋发生过关系，所以它的位置在齐、燕、晋三个国家包围之中，因此推断延庆这块地方属于山戎，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六 一点建议和希望

我感觉，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样，玉皇庙文化是另一样，西边的鄂尔多斯又是一样。因此，从考古学惯例来看，是不是把玉皇庙遗存定名为“玉皇庙文化”，而推断说属于山戎。因为发掘出500多座墓葬，出土了数万件文物，拥有从滦河到潮白河这么广阔的特定地域，已清楚地显示了其自身的个性，所以定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我觉得没什么大的偏差。但是我们推断是“山戎”，凡考古工作者都知道，我们的考古材料如果没有得到证实，无论怎么说都还是“推断”。推断属于山戎，不是说是山戎。这两者是有界限的。考古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当考古学说“是”的时候，也就不能说“不是”了。但是这种实证是很难的，晋宁石寨山那批材料，认为是滇人的。那是因为出土文字的实物证实了那批东西的确属于滇族的，这是真的。除此而外，大都是推断。搞民族史的同志，经常追问出土的东西到底是属于哪一族的。而我们搞考古的大都是推断。推断是允许的，至于说“是”，就不好办，关于这个问题许多同志想请搞人类学的专家解决。但体质人类学只能搞到“种”，再往下搞到族属那就难了。这不是我们国内人类学家水平低，世界上的

人类学家都是这个水平，现状如此。夏家店上层与玉皇庙这里，都清楚一些了，那么再往西，再往晋北、内蒙古的西部多做一些工作，大家合作，把文化面貌搞清楚，同样十分重要，因为往西还有林胡、楼烦，还有匈奴。

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纂的《军都山墓地》发掘报告出版之机，提出以上几点看法，供学术界讨论。愿本报告的出版能更好地促进和推动中国北方青铜文化考古和北方民族学相关课题的研究。

佟柱臣

2005年6月26日

前 言

冀北山地一带蕴藏的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较为丰富，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发现，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更有十余处遗存地点有成组或成批器物出土，但这些发现均属被动发现，绝大多数为零散征集资料，经科学发掘者甚少，据此研究此类文化的性质、年代、源流及与周邻文化关系等问题，无疑存在很多困难。有不少学者曾将这类遗存或直接视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混为一谈。那么这类遗存的内涵特点到底是怎样的？其文化性质到底该如何认定？它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等，学术界对此一直相当关注。鉴于这种情况，198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主动组建了军都山考古队，专以探索此问题为课题，赴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玉皇庙、葫芦沟和西梁堍三处属于东周时期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其主要文化内涵特征之一的氏族部落墓地，于1985年8月至1991年11月进行了有计划的科学发掘。这项为解决学术问题而主动开展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最终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果，其中以玉皇庙墓地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发掘墓葬400座），其中既有普通的中、小型墓葬，也有数量较多规格级别较高的贵族墓葬，出土文物较为丰富，资料系统而完整。更为难得的是，在该墓地发现了可以区分早、晚期墓葬的地层资料，这不但为该墓地的分期断代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为解决整个冀北山地此类文化遗存的分期断代问题找到了一把钥匙，树立了一根标尺。鉴于玉皇庙墓地所具备的代表性特点和较高的学术价值，我们特将以军都山玉皇庙墓地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玉皇庙文化”。以期今后对冀北山地同类文化遗存的深入研究，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本课题工作的开展，曾得到恩师苏秉琦、佟柱臣二位先生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于杰先生，及北京大学考古系著名教授邹衡先生、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